

轿车沿着107国道一路向南，车上的父子都在沉默。

为了促成这趟行程，父亲郑彩清磨了儿子小半年，请了亲戚轮番说服，此时，他感觉自己像个准备上战场的战士，“我只管往前冲啊”。

相比而言，儿子郑军飞的心态更复杂，他不愿意父亲为自己冒险，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但是，他太想活了，许多人的生活还指望着他。

车辆经过大片的水稻田——郑彩清在田里劳作了一辈子，把他的弟弟妹妹、他的孩子拉扯成人。行程的终点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（以下简称“湘雅医院”）。此行，他们要去医院做肾脏配型的检查——将近80岁的郑彩清能不能给身患尿毒症的郑军飞捐个肾？

### 捐不捐

关于捐肾的辩论，在这个家庭里持续已久。准确来说，是单方面的说服。

郑彩清摆出了很多理由，比如，排队等肾源太难了，不一定排得上。即便排上了，还要交纳约20万元的肾源费用，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，是笔不小的支出。

这位父亲还讲了一个案例：村里一位母亲，十几年前捐了肾给儿子，如今，母子都活着，儿子甚至成家生了娃。“人有一个肾就够了。”郑彩清坚持，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捐肾，移植后不容易有排斥反应。

郑军飞心里清楚，除了父亲，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都不适合捐肾：他的母亲、哥哥已经离世；女儿还在上大学，还没成家生子，他不可能让女儿捐肾。

湘雅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丁翔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评估供者时，医生倾向于年长的捐献者，因为年长者的预期寿命较短，捐献行为对供者造成的潜在健康影响相对有限。国内的医学指南建议捐肾者最好在65岁以内，但在临水上，丁翔接诊过数例超70岁的父母为儿女捐肾的病例，国际上最高龄的捐肾者是90岁。

但从情感上，郑军飞犹豫了。他宁愿一直做透析，宁愿去医院登记排队等肾源，也不愿意要父亲的肾。他是湖南省汨罗市川山坪镇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，自从确诊尿毒症后，每周3次去医院透析，只能跟单位请病假。

这个湖南男人个子不高，长了一张圆脸，看上去很壮实，“原来我有180斤呢”，他笑着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“生病后瘦了30多斤”。

他今年48岁，父亲已近80岁，他担心移植手术后，尿毒症没治好，还拖垮了父亲的身体。他预想最差的结果是，“做移植手术后，父亲没了”，他不愿意接受这件事。

父子观点僵持的那段日子里，郑军飞遵医嘱去血透。他的一周被透析切成三段，透析当天，他要早早起床，耗在医院大半天，忍受头疼、没劲儿、血压升高。

他原以为能一直靠透析维持病情。但坐在透析室里，周围大多是比他年长的病人，在讨论“谁透着透着就死了”“哪个老人透几年就死了”。郑军飞看了一眼手臂上的红色管道，清楚自己的病情比其他人更重，“那会儿就觉得你是个异类，已经不在原先的生活轨道了”。

每次透析后回到家，郑军飞的脸色和情绪是郑彩清的“晴雨表”，如果他精神状态好，父亲跟着高兴；如果他有点蔫，父亲亦是闷闷不乐。关于治病，郑彩清比郑军飞还着急，总是催着他，“我时时刻刻希望着他好，望他去上班”。

有时气急，郑彩清用拐杖敲地板，大声埋怨郑军飞，“为什么不早些去看病？每年你们都可以到医院去做体检，为什么没去？”

这个精瘦的老人有一双明亮的眼睛，颧骨略高，似乎他认定的事，都会如他所愿。他习惯坐在客厅固定的位置看电视，交谈时总是低声细语，只有想喊儿子时，他才稍微提高音量，连名带姓地喊：“郑军飞！”

家里的长辈一面倒地支持郑彩清。郑军飞的叔叔姑姑表态，父母为生病的儿女捐肾是件很正常的事。叔叔甚至对郑军飞说，“我的肾要是能捐，我也捐给你”。

“我捐肾给儿子是自愿的，是一个父亲的本能，是天下父母心中的一分子。我是为了救儿子，也为了使我自己有一个完整的、幸福的家庭。”郑彩清对中青报·

## 冰点特稿第1339期

# 八旬父亲给儿子第二次生命



郑军飞站在自家菜园里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魏晞 摄



郑军飞网购了几盆绿植，种在屋外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魏晞 摄



吹气球可以锻炼肺功能。郑彩清双手捏着气球头，鼓起腮帮子吹气，发出噗噗声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魏晞 摄



郑彩清习惯坐在客厅固定位置上看电视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魏晞 摄

中青网记者说。

郑军飞最终妥协了，“我身体不好，他也不会好”。

他知道，父亲的生活将来还得靠自己撑着：2017年，郑彩清骑着摩托车在村道上摔倒，摔伤了颈椎神经，被医生判断可能要终身坐轮椅。郑军飞和妻子每天下班到父亲家吃饭，帮忙修灯、换液化气、买菜……他怕父亲摔跤，给父亲家装了摄像头。

“就当是体检吧。”儿子想，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，很少做体检，上一次体检还是十几岁，想报名当兵时。体检通过后，郑彩清家里却突遇困难，他成了唯一的劳动力，后面还有5个年幼的弟弟妹妹。于是，郑彩清放弃当兵，转向种地。

即便答应了父亲的请求，郑军飞心里还有疑问：父亲那么大岁数，肾脏还适合捐献吗？这个疑团，他决定交给医学。

### 术前

肾脏配型的检查不是一次完成的，郑彩清至少去了7次。

他最小的弟弟、郑军飞的小叔一次不落地跟着。郑军飞的妻子有时也去，这个做事爽利的女人在父子俩所有的手术单上签字，“（手术）越快越好，对两个人都好。父亲年纪越大，越推迟越没有希望。”

器官移植中心护士长张小琼解释，为减轻患者负担，肾脏移植的匹配检查是分步进行的，先给肾移植供体做便宜和基本的检查，评估通过后再继续做其他费用高的检查项目。

行驶在国道上，汽车的后备厢里装着馒头、面包、衣服和轮椅。几十年前，父子俩也曾沿着国道的反方向去往医院，那时年幼的郑军飞摔坏了牙，父亲带着他去汨罗的医院补牙，去了十几趟。

现在，行程的终点关乎生死。到达湘雅医院后，医生很快为他们做了检查，最终评估，郑彩清的肾脏质量和匹配程度完全满足捐献要求。

护士长张小琼记得，每次检查，郑彩清都会说，“我身体很好”，生怕查出问题，没法给儿子捐肾。他对所有检查极其配合，“怎么折腾都行，能捐就行”。

一切好像都太顺利了，就连一个曾被视作移植领域的“高危区”——血型不同的问题，如今也被医学界攻克。丁翔说，郑彩清是A型血，郑军飞是O型血，以前不同血型的人不能捐器官，因为移植后可能会发生极为剧烈的超急性排斥反应。

丁翔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给身体“脱敏”的办法是，手术前通过血浆置

换或者免疫吸附清除郑军飞体内已有的血型抗体，同时用药物消灭产生血型抗体的免疫细胞，等到移植成功后两周，郑军飞体内的自身免疫系统对配对的血型抗原发生免疫耐受，就大概率不会发生排斥。

然而，这位有近20年经验的器官移植专家，这次不得不更严阵以待——郑彩清是他接诊的最高龄的捐肾者，手术要同时解决高龄和血型不同的问题，即便在国际上，也是相对罕见的。

“我不是想刷新某个医学纪录。”丁翔说，“从病人角度想，这个手术确实能让受体（郑军飞）获益，于是我愿意冒这个险。”他说，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必备的因素之一，是有一颗狮子般敢于冒险的心。

问题最终还是出现了。郑彩清被检查出腹主动脉瘤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郑彩清吓一跳，“我有癌症了？”

“不是癌症，是肿瘤。”丁翔解释，如果瘤体不破裂，这个肿瘤不会引起大问题。

郑彩清放下心来。他以前不怕死，但自从儿子生病后，他开始珍惜生命，“我一死，没有一个好肾，没有好肾源，救不了儿子了。我不是怕死，我是不能死、死不得。”

长在郑彩清腹内的血管瘤约5厘米。湘雅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王宏伟解释，如果不做供肾手术，以郑彩清的年纪，他会建议先不做手术，观察一段时间。

但这个血管瘤就长在肾动脉下方三四厘米处，卡在“倒Y型”血管的关口，就像水管长时受压后鼓起一个包。王宏伟担心，动脉瘤的外壁很脆，做供肾手术时，一旦破裂，会引起腹内大出血。

不同科室的医生们商量后，决定先解决郑彩清腹内的“小问题”。

今年5月，郑彩清离开家，第一次住院。他记得，那时家门口的水稻田刚刚插上秧苗，郑军飞给桃树上结的小果实在上了防虫的袋子。9年前，郑彩清把祖屋翻了新，建了两层房，对着一大片水稻田和连绵低矮的山丘，房子四周种着果树、蔬菜，还挖了一个小鱼塘。

王宏伟回忆，郑彩清的手术难度不大，但这是他接触过的第一位因为供肾来做腹主动脉瘤手术的病人，“要把前面的这个手术做好，不能耽误他给孩子捐肾”。他计划用微创的方式，将Y型支架放入动脉瘤所在处，血会顺着支架往下流，减少动脉瘤的压力，瘤不会再长大。

他和郑彩清沟通这个手术方案时，对方似乎不太关注这些细节，只是希望赶快做手术，这样就能捐肾了。他查房时，指着郑彩清对其他医生说：“你们看看，这是位伟大的父亲。”

他说自己担子重，“不敢病”“怕得大病”。3年前，为了预防疾病，这位20多年的老烟民果断戒了烟，同时戒掉了熬夜，“我平常注意的（事）比别人多，可还是病了”。

他最初挂了湘雅医院的皮肤科，但入院后血检，发现血肌酐已经高达3170 $\mu\text{mol/L}$ 。

肾内科副教授唐荣被通知来皮肤科会诊。唐荣回忆，第一次见到郑军飞时，他脸色苍白，神情疲乏，血检结果显示，郑军飞严重贫血，血红蛋白只有57g/L。成年男性的血红蛋白至少在120g/L。

她判断这是典型的尿毒症，血肌酐是评估肾脏功能的重要指标，成年男性的血肌酐一般在53-106 $\mu\text{mol/L}$ 左右。“他特别能忍。”唐荣说，“一般人血肌酐到了700 $\mu\text{mol/L}$ 以上，可能做透析人才能舒服，他超3000 $\mu\text{mol/L}$ 了还能受得了。”

“糊涂！怎么没有做体检！”说话一向

感觉孤独，因为有电视机、有朋友。

现在，为了一颗好肾，郑彩清把烟、酒、辣都戒了。“我（说）不吃就不吃了。我有一个信念，就是有一个好身体，才能救儿子！”

他查出高血压十几年了，降压药总忘吃，但最近一年，他每天规律地吃降压药。他连家里的二楼都不上去了，怕爬楼梯。他一摔跤，会延迟供肾手术的时间。

Y型支架顺利地安置到他的腹内，手术的伤口在数个月后几乎看不见。

郑军飞形容父亲的身体是“特殊材质”做的，“那么大年纪，肾还那么好”。他把一切归结于父亲的信念，“他总觉得生活会越过越好，热爱生活，坚持锻炼”。

他最佩服父亲的一点是，当年车祸后，郑彩清坚持锻炼，想把拐杖和轮椅丢了，自己走路。这些年，他从卧床，慢慢坐在轮椅上，再自己站起来，推着轮椅走。如今，郑彩清依赖轮椅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在家里，他迈着碎步走，不需要别人搀扶，每一步都踩得很稳。看电视时，广告来了，他站起身，双手撑在桌子上，心里默念着节拍，用不大的幅度踢脚、转脚腕——这是他自创的锻炼方法。

丁翔教他用吹气球锻炼肺功能，郑彩清每天都练——双手捏着气球头，鼓起腮帮子吹气，发出噗噗声。酸疼的腮帮子提醒他，距离能给儿子捐肾，又近了一步。他已经吹破了5个气球。

接触过这对父子的医护人员都提到，这对父子好沟通。护士长张小琼说，“病人那么信任我们，也让我们愿意去挑战难关。”

一轮又一轮的术前检查，让郑军飞更加相信医生们的专业判断——如果医生们认为移植手术可以做，那他也不再犹豫。

这个中年男人以前总想扛事。他是父亲唯一活着的孩子，家里的顶梁柱。2017年父亲骑摩托车摔了，他付了十几万元医药费，睡在病房的厕所里陪护。“（女儿）上大学后，给我打电话比打给她妈多。”提起这点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他享受女儿的依赖。

他的病是父亲第一个发现的。郑彩清记得，郑军飞一如往日来他家帮忙，他听见郑军飞在厕所里发出声响，顺着声音去看，发现儿子正在呕吐，还流鼻血，于是打电话喊儿媳把郑军飞送去医院。

此前一个月，郑军飞已有全身瘙痒、呕吐的症状。他尝试走快步，走得满身是汗，感觉没那么痒了，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缓解的办法。最近一年，郑军飞连单位的常规体检也没去。

他说自己担子重，“不敢病”“怕得大病”。3年前，为了预防疾病，这位20多年的老烟民果断戒了烟，同时戒掉了熬夜，“我平常注意的（事）比别人多，可还是病了”。

他最初挂了湘雅医院的皮肤科，但入院后血检，发现血肌酐已经高达3170 $\mu\text{mol/L}$ 。

肾内科副教授唐荣被通知来皮肤科会诊。唐荣回忆，第一次见到郑军飞时，他脸色苍白，神情疲乏，血检结果显示，郑军飞严重贫血，血红蛋白只有57g/L。成年男性的血红蛋白至少在120g/L。

她判断这是典型的尿毒症，血肌酐是评估肾脏功能的重要指标，成年男性的血肌酐一般在53-106 $\mu\text{mol/L}$ 左右。“他特别能忍。”唐荣说，“一般人血肌酐到了700 $\mu\text{mol/L}$ 以上，可能做透析人才能舒服，他超3000 $\mu\text{mol/L}$ 了还能受得了。”

“糊涂！怎么没有做体检！”说话一向

温温柔柔的唐荣看着郑军飞的血检单，提高了音量。

唐荣记得，有一天，郑军飞突发高烧，烧到40度，即便在发抖、打冷颤时，他依然很清醒地对医护人员说，“配合你们”，依旧是那副不焦急、“很能忍”的样子。

确诊后，唐荣向郑军飞介绍尿毒症的3种治疗方法，分别是腹膜透析、血液透析和肾移植。唐荣发现，郑军飞当时的表情“有点懵”“脸上没有反应”，似乎对“尿毒症”不太了解。

在肾内科的病房待了很多天后，这个体型健壮的男子必须接受自己“不扛事”了：妻子陪他外出散步，刚走一会，他感觉后背出汗，就像长了痱子一样，又胀、又痒、又痛。阳光照在小路上，他突然觉得自己走不动了，要赶紧回病房。

湘雅医院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评估认为，换肾手术在可控范围内。器官移植中心的专家讨论时，也认为虽然手术存在高风险，但相对可控。术前谈话，丁翔问郑军飞，愿不愿意接受有瑕疵的肾脏，而不是年轻的肾脏——术后只能帮助郑军飞摆脱透析，满足正常生活，但是各项指标仍处偏高的状态。

郑军飞的回答是，不能保证外来的、年轻的肾脏就不出问题，用父亲的肾脏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“医生肯定希望有年轻的捐肾者，疗效好，但是这位父亲捐献意愿强烈，且肾脏符合医学要求，医学伦理上也倾向年龄大的捐献者。如果不做手术，父亲会遗憾。”丁翔说，这也考验了医疗团队在各个阶段的综合能力，包括围手术期管理、免疫调节、术后护理等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家门的晚稻即将成熟，关键的手术就要开始了。

### 比预期时间更长的手术

9月17日早上7时许，距离80周岁还有半年的郑彩清被推入手术室，他在心里默念“菩萨保佑，一次成功”。

8点58分，丁翔开始主刀手术，如果顺利，手术将在10点半结束。这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很快在郑彩清的右侧腹壁上开了3个孔，放入腹腔镜的仪器，探查右肾。他看到，郑彩清的右肾表面长有小囊肿和瘢痕——这在老年肾脏中很常见，不影响肾的功能。

手术开始了约20分钟。正当丁翔准备下一步操作时，郑彩清的心率突然变慢，血压急速降低，监护仪上的数值远低于正常值。手术室里所有医生瞬间紧张起来。

很快，坐在办公室里的王锷接到了紧急求救电话。作为湘雅医院麻醉手术部主任，王锷是“救火队员”，只有最危急、最棘手的手术才会喊她。麻醉医师在外科手术出现问题时，需要快速反应，抽丝剥茧找出病因，精准调整药物的种类、剂量，这高度依赖临床经验。

此时的郑军飞，正在病房里等待。身边围着他的家人、护士，有亲戚进病房里看一眼郑军飞，又去手术室外等着郑彩清。

郑军飞心里很忐忑，既牵挂父亲的安危，希望手术快点结束，又担心自己的手术能否成功。他拿起手机刷了刷，但里面的内容一点也看不进去。他最后选择躺平，把脑子清空，“麻醉自己”。

很快，王锷出现在手术室里，此时郑彩清的心脏“快停了”。